

如何看待全球化

Peter
Singer

写给每一个
关心世界的人

ONE
WORLD
NOW

[澳] 彼得·辛格 / 著

沈沉 / 译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Peter
Singer

如何看待全球化

写给每一个
关心世界的人

ONE
WORLD
NOW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澳] 彼得·辛格 / 著
沈沉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如何看待全球化： 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

[澳] 彼得·辛格 著
沈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看待全球化：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 / (澳)
彼得·辛格著；沈沉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ISBN 978-7-5596-0876-5

I. ①如… II. ①彼… ②沈… III. ①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2694号

**One World Now: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by Peter Singer

Copyright © 2002, 2004, 2016 by Peter Sing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7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5834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谢哈曦 夏应鹏
特约编辑 王微
美术编辑 晓园
封面设计 汐和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90千字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9印张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0876-5
定 价 58.00元


UnRead
—
思想家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2000年年初，就在前一年12月于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遭到抗议扰乱之后，我开始筹划一本书，也就是后来的《一个世界》(One World)。我的目的是要从伦理学角度考察一下世界在哪些方面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在哪些方面还没有。但没等我写多少，小布什就成了美国总统，而他组建的那届政府，却公然敌视众多的全球性机构和制度，从联合国到国际刑事法院，再到《京都议定书》——一项为阻止或减缓气候变化而首次通过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协定，以此来尝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一而足。

随后，2001年9月11日，在最后润色这部书稿的时候，我跟普林斯顿大学那些瞠目结舌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见证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燃起熊熊大火，然后轰然倒塌。在对文明冲突不绝于耳的讨论声中，“同一个世界”的理念突然发出了刺耳的不和谐之音。尽管如此，那天的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继之而来的回

应，仍然证实了世界渐趋一体化的观点。因为这场事件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如何强大，都有可能遭受来自全球任何一隅的致命袭击。一届先前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见满不在乎的美国政府，如今却发现，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行动中，自己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虽然它后来又将全球性机构与制度踢到一边，未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批准，就错误地发动了最终损失惨重的伊拉克战争。因此，我仍保留了原来的标题，既是为了描述这个地球上联系日益紧密的生活，也是为了指出我们伦理思考的基本单元应当是什么。

《一个世界》触动了高校内外的广大读者。但2002年以后，世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重新审视一下包括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国际法和全球贫困这些全球化问题适逢其时。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本书保留了《一个世界》的基本结构，并修订和更新了部分内容，但同时也考量了一些重大的新变化，包括：

- 在《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未能达成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2015年在巴黎达成的非强制性协议采纳了新途径；
-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力衰退；
- 当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阻止针对本国公民的反人类罪行或种族灭绝时，国际社会就有责任去保护他们，这一新出现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 在削减极度贫困方面，尽管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

· 迫切寻求安居之所的国际难民与国内流民人数剧增。

我之所以开始写作《一个世界》，是因为 2000 年我受邀参加在耶鲁大学举办的“特里讲座”（Terry Lectures）。我要感谢“特里讲座委员会”（Dwight H. Terry Lecture Committee）的成员，包括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罗伯特·阿普佛（Robert Apfel）、拉德利·达利（Radley Daly）、卡洛斯·艾尔（Carlos Eire）、利奥·希奇（Leo Hickey）、约翰·赖登（John Ryden）、戴安娜·维特（Dianne Witte）和理查德·伍德（Richard Wood），感谢他们决定将这一荣誉赐予我。耶鲁的听众为我提供了首次反馈，后来又仰赖于众多知识渊博且乐于助人的朋友和同事仔细阅读和协助。这些都令我受益良多。波拉·卡索（Paula Casal）和布伦德·霍华德（Brend Howard）通读了《一个世界》的草稿并提供了评论，马特·波尔（Matt Ball）、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尼尔·埃亚勒（Nir Eyal）、彼得·戈德菲-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艾力克斯·戈瑟里斯（Alex Gosseries）、罗莉·格伦（Lori Gruen）、戴尔·杰米森（Dale Jamieson）、安迪·库珀（Andy Kuper）、薇薇安·列文（Vivian Leven）、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达瑞尔·麦克劳德（Darryl McLeod）、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尼克·欧文（Nick Owen）、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列夫·维纳（Leif Wenar）和梅丽莎·威廉姆斯（Melissa Williams）等人都从各自不

同的专长领域对书中的特定章节做了评述。阿伦·杰克逊 (Aaron Jackson) 和迭戈·冯·瓦卡诺 (Diego von Vacano) 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 而我的助理金·吉尔曼 (Kim Girman) 则欣然且有效地完成了我交办的许多任务。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琼·汤姆森·布莱克 (Jean Thomson Black) 自始至终都为我提供了助力与支持。

在本书历年的写作过程中, 曾有许多人就《一个世界》向我提出过建设性意见, 他们都令我受益匪浅。即便我能记住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在此也无法一一列举。但是, 我依然想在此鸣谢约翰·赫斯 (John Huss), 多年来, 他一直将《一个世界》作为其在阿克伦大学开设的“伦理学导论”课程的进阶内容。他在课堂上试讲了本书的部分草稿, 并向我提供了课堂反馈, 还有他的助教内文·约翰逊 (Nevin Johnson) 及他的学生扎里克·贝尔 (Zarek Bell)、乔·克莱因 (Joe Klein) 和内森·尼古拉斯 (Nathan Nicholas) 等人对此书的评论。

加雷斯·埃文斯热心地阅读了第四章中关于保护责任的部分, 他的评论使我完善了这一部分内容。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某位匿名评审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

普林斯顿大学特别是人类价值研究中心 (University Center for Human Values) 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最为理想的研究与写作环境。在《同一个世界》与本书写作期间, 艾米·古特曼 (Amy Gutmann)、乔治·凯特布 (George Kateb)、斯蒂芬·马塞多、艾伦·帕顿 (Alan Pattern) 和查克·贝茨 (Chuck Beitz) 均曾担任该中心主任, 我要一并感谢他们的支持。我讲授的“实践伦理学”的各位学生也


曾作为听众批判性地听取了本书部分内容。由于本书完成于澳大利亚，我还要感谢墨尔本大学的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为我提供办公室和惬意的工作环境。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勒娜特。她的爱意与陪伴不断为我的生活和事业增光添彩，她身上的冒险精神也促使我决定来到美国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本书就是这一抉择的成果之一。

彼得·辛格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
墨尔本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

目 录 | CONTENTS

前言	i
第一章 一个变化着的世界	001
第二章 我们拥有同一个大气	019
第三章 我们拥有同一个经济	073
第四章 我们拥有同一个法律	127
第五章 我们拥有同一个共同体	179
第六章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29
注 释	234
人名对照表	271



第一章
一个变化着的世界

- A CHANGING WORLD -

该优先考虑我们的同胞吗？

请考虑全球化的两个层面：第一，生活在阿富汗、伊拉克或也门的人，有能力将死亡和恐惧突如其来地带往纽约、伦敦、马德里、巴黎和悉尼；第二，发电厂、汽车甚至还有牛群排放的温室气体。前者留下了令人难以磨灭的图景，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后者导致地球气候产生了变化，但只有通过科学手段才能检测。然而，两者却共同揭示了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同一个世界，而且汽车排放带来的那些十分不明显的变化，正在杀死更多的人，其数量远远多于恐怖分子明目张胆杀的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科学家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会危及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但各国领导人却一直难以达成一致的方案，实现充分减排，避免这种严重的气候风险演变成毁灭性的气候灾难——虽然这样一份协议明显符合全世界的整体利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的阐述中看到的，就连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也仅仅是杯

水车薪。

从小布什身上我们能再好不过地看出，人们是多么缺乏必要的全球视角。在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排放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作为该国总统，小布什却声称，“我们绝不会做任何伤害我国经济的事，因为美国人民才是重中之重。”¹这一说法绝不唐突，而是表达了众多政治领袖眼中天经地义的伦理观点。小布什的父亲，即老布什总统，也曾在1992年召开于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高峰会议（Earth Summit）上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要求老布什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资源过度消耗问题——列入议程，但老布什却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置喙。”意思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容不得讨论，即便这种生活方式长此以往将会导致数百万人因日益难测的天气状况而死亡；即便长此以往，随着海平面上升和区域性洪涝，将会有数千万人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²

但是，将美国人的利益摆在首位的，绝非只有这两届布什政府。20世纪90年代初，在讨论是否应当干涉波斯尼亚，阻止塞尔维亚人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动时，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时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曾正面引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言论，声称全部巴尔干人民都不如他一个士兵的骨头重要。³不过，俾斯麦说这句话的目的，绝不是要去干涉巴尔干，阻止反人类的罪行。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认定他的国家应当遵从国家自身的利益。把此人的言论当作反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论据，就等于要回归

19 世纪的强权政治，而无视这种政治模式曾在 20 世纪上半叶引发的血腥战争，也忽略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人们为了奠定和平、遏止反人类罪行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在科索沃，尽管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美国人生命绝对优先”的政策并不妨碍保护科索沃人的干涉行动，但是干涉行动仅仅限制在采用空袭手段上。这一战略相当成功：北约（NATO）的部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仅有约 300 名科索沃人、209 名塞尔维亚人和 3 名中国人遇难。2014 年至今，在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威胁要踏平伊拉克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也采用了类似“仅限空袭”的战略来应对。该战略同样避免了美国人的伤亡，但是正如伊万·伊兰德（Ivan Eland）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仅仅采取空袭战术，那么 ISIS 就会躲藏到城市里去。美国如果想将这个组织从角落中赶出来，消灭其爪牙，就只能被迫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⁴

在评论美国靠空袭保护科索沃人民的问题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写道：“如果一个道德准则允许 100 万无辜异族平民沦为赤贫，理由只是你不愿意自己的哪怕一个职业军人去冒任何生命危险，那么这种道德准则就是邪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派出“地面部队”就总是对的：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曾引发了地区性的混乱，ISIS 由此而崛起。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者的估计，以战前状况测算，此次行动还导致了 65.4 万多名伊拉克人死于非命。⁵ 无论如何，加顿艾什的评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一国的政治领导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将自身角色定位为仅限于促进本国公民的利益，而又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全

世界所有人的福祉？

关于这点，正如加顿艾什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伦理主张那样：领导人将本国公民的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某个无辜人类的生命价值，并不会因其国籍而有所区别。然而，也许有人会说，“人人有权接受平等考量”这一抽象的伦理观念，并不足以规定政治领导人的义务。正如我们的观念中，父母应当优先考虑其子女而非陌生人的利益一样，任何人如果做到了美国总统的职位，他就成了一个特定角色：有义务保障和促进美国人的利益。其他国家有自己的领导人，因而也应该为了他们各自同胞的利益而承担类似的角色。世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而且只要情形一直如此，就必须有主权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必须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除非大部分选民突然变成了某种前所未见的利他主义者，否则西方民主制度将会无法正常运转。美国选民不会选择一个在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伊拉克人或阿富汗人的利益之间不分轻重的总统。政治领导人都会认为，他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并且在上述论证中，他们这么做是正当合理的。

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

世界被分割为不同的主权国家，是否构成了一个支配性的、无法改变的必然现实？那些发生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科索沃的骇人事件，已经影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比如在卢旺达，联合

国的一项调查认为，如果当时有 2500 名得到恰当训练和指挥的军事人员，将有可能拯救 80 万条人命。⁶ 科菲·安南（Kofi Annan）时任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他当时的无所作为被调查报告评价为“既可怕又可耻”，因此，他注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在当上联合国秘书长后，曾呼吁：“当侵犯人权的行为公然、有计划地发生时，世界绝不能袖手旁观。”他还说，我们需要一些“合法、普遍的原则”，来作为干涉行动的依据。⁷ 后来，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第四章详细讨论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与会各方达成一致：世界共同体有责任保护任何国家的公民免于遭受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危害，即便这意味着需要对某些正在其领土范围内实施此类罪行的政府采取军事干涉。这一责任被普遍认可，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称其为“360 年来关于主权做出的最为重大的调整”。换句话说，它是 1648 年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确立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他国事务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⁸

恐怖主义怎样弱化国家主权？

另一方面，2001 年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的后果则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凸显出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对国家主权的理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一百多年前的 1914 年夏

天，也有一场恐怖主义行动震惊了世界：一名来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及其妻子。暴行发生后，奥匈帝国立即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举证说明这名刺客接受了“黑手社”（Black Hand）提供的训练和武装，而黑手社乃是由塞尔维亚军情首脑所领导的一个秘密组织。黑手社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人员的纵容、支持，后者为刺杀计划的7名嫌疑人安排了进入波斯尼亚的安全入境通道。⁹因此，奥匈帝国在最后通牒中要求塞尔维亚人将嫌疑人员绳之以法，并要求允许奥匈帝国的官员查阅相关文件，以确保能够彻底追责。

尽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证据极为确凿——有塞尔维亚官员卷入了这桩罪行，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的最后通牒却遭到了俄、法、英和美等国的广泛谴责。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称其为“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独立国家发出的最可怕的文件”。¹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关于“一战”的官方历史文献则少了一些外交措辞，批判这一通牒为“一份恶毒的文件，纯属无端的指控和专横的要求”。¹¹许多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都曾指责过奥匈帝国的这份通牒，认为它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一个主权国家能向另一个主权国家要求的合理限度。他们甚至还补充说，在塞尔维亚虽非全部但至少部分接受了奥匈帝国的诸多要求之后，奥匈帝国依然拒绝谈判，这进一步证明了，奥匈帝国及其背后支持者德国只是想要一个发动对塞尔维亚战争的借口。所以，它们必须为发动战争并导致900万人死亡一事承担应有的罪责。

现在，请回想 2001 年由当时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Al-Qaeda）策划的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对此事件的回应。相比 1914 年针对塞尔维亚的那些要求，布什政府 2001 年向阿富汗政府提出的要求并不逊色。（主要区别在于，奥匈帝国坚决要求镇压心怀敌意的民族主义宣传，因为当时言论自由还不是当时的工人的人权。不过，由于美国本国宪法对言论自由提供了强力保护，所以，美国很难要求塔利班去做这种在美国国内违宪之事。）然而，美国的这些要求不但没有被指责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且得到许多国家的一致赞同，认为它们正当合理、无可非议。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小布什总统在各种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他不会区分恐怖主义者和庇护恐怖主义者的政权。没有任何一个大使、外交部长或驻联合国代表对这一说法进行谴责，批判其为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恶毒”主张或“专横”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 2001 年 9 月 28 日的决议，清晰无误地认可了小布什的这一主张。¹² 看起来，各国领导人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负有一种责任——必须镇压本国境内的某些活动，以免他们在别国境内制造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此国不这么做，那么对其发动战争将是合理的。这可以表明当今世界在通往全球共同体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当初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阴谋分子要接近他们的行刺目标，只需悄悄越过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境，而如今的恐怖主义却不再是地方性乃至区域性的了。驾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跨越的距离要远得多（大多数都是沙特阿拉伯人），而 ISIS 则一直在互联网上兜售恐怖主义，并煽动其追随者在自己居住的国